

座談會第1及2節程序3

梁振英、唐英年回答提問

- 編者按：1 本文內容是根據錄影帶記錄，因篇幅關係，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刊出前未經講者過目。
- 2 答問的先後次序乃根據講者出席座談會的先後排列。
- 3 所有提問，除另行註明外，均為提問者個人意見，與華員會或衛生界專業團體聯席會議立場無關。

甲 關於管治、公務員團隊

1問：

華員會認為：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公務員隊伍在欠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經驗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應對了無數的挑戰，取得了不應被抹煞的成績。但另一方面，尤其是近幾年，港人看到的是：特區政府的管治經常處於“疲於奔命”、“舉步維艱”，政策的制定、諮詢和推行“一波三折”、“好事多磨”、“吃力不討好”的境地。

為逐步改變這種局面，華員會主張：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可以做、應該做的事情之中，例應包括：

- 1 特區政府應帶動全社會檢討和總結回歸以來的管治經驗，包括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公務員政策、特區政府內外部的諮詢協商架構，制定可優化管治、凝聚公務人員和社會的理念、方針、政策和措施，以有效提升整體公務員隊伍的士氣、團結他們、與他們同心同德應對巨大挑戰。
- 2 特區政府應大力推動和促使各司、局，各部門，更積極主動與各級議會、社會各界真誠互動，在政府政策、措施醞釀初期和推行之前，即進行充分的溝通協商，藉此建立互信、互重、互動的社會夥伴關係，共同構築社會夥伴合作新文化。華員會認為，這將有利於社會共識的凝聚、和諧社會的建立。

2問：

華員會認為：為達致上述目標，制定與時俱進的新公務員政策、協助各級公務人員轉換角色、培養主人翁精神，建立一支與時俱進、具如下特質的公務人員隊伍，即：穩定、士氣高昂、高效率、高質素、廉潔、能有效回應知識經濟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及國家高速發展帶來的挑戰，對政府有向心力、對社會有歸屬感和承擔，是優化管治的關鍵之一，十分重要。

為此，華員會主張：特區政府應大力推動和促使各部門、各公營機構各級管理層在各政策和措施醞釀的初期和推行之前，即須積極主動與各中央評議會職方、各公務人員工會團體、各級員工，真誠互動，進行充分的溝通協商，藉此建立互信、互重、互動、和諧、夥伴共生、合作的、新型的僱傭及員工關係和緊密的工作關係，共同構築公務人員隊伍夥伴合作新文化、新員工關係。

對此，您有何看法？

梁振英：**要在社會做好人心工程**

這裡有2個問題、3個部份，主要講2種關係：一個是行政長官所領導的政府同公務員的關係，另一個是政府與整體社會的關係。我認為要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向，以及解決問題的性質。過去我寫過文章，認為要在社會做好人心工程，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性質，怎樣看待我們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怎樣看待我們政府與公務員的關係，是人心工程。

認同華員會意見，做法：engagement

做法是什麼，是我剛才講的engagement。其實黃河先生提出的問題，裡面隱隱約約提到解決方案，我是同意的，多溝通多交流，如“積極主動與各中央評議會職方、各公務人員工會團體、各級員工，真誠互動，進行充分的溝通協商，藉此建立互信、互重、互動、和諧、夥伴共生、合作的、新型的僱傭及員工關係和緊密的工作關係”，我是十分同意的。

政府在這2個關係上，不是領導、被領導，管治、被管治的關係，政府與整體社會是夥伴關係，政府與公務員的關係，亦是一個夥伴關係。如果我們可以做到與社會整體夥伴關係，做到剛才黃先生講到的溝通協商，等等，我們就能真真正正做到行政主導。

行政主導前提：做好溝通與互動

行政主導不是我們寫在《基本法》，它就自自然然地出現，它不只是一個法律規定。行政主導，主導什麼？就是與各級議會、社會各地區各階層做好溝通與互動的關係，無這個前提，行政主導只能停留在法律層面上。

另外亦想講下，大環境的影響。過去建制不斷被衝擊，建制一部份就是政府。我們可以看什麼呢？好似2008年那場立法會選舉，有一位比較激進的當選，當時有選民覺得這位議員的言行比較得意，所以投票選他。當年有3位同屬同一個政治組織的當選，得票率佔全港的10.4%，屬比較高的比例，而當時2位工商界的資深代表卻落選，這是個警號。我們還需要做一些大環境的工作，要消除社會的怨氣，否則，積聚怨氣，往往衝擊的是公務員。

唐英年：**華員會提問與我心想的完全一樣**

提問與我心想的完全一樣。我們過去挑戰不斷，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這些是外來的衝擊，我們公務員團隊能上下一心、緊守崗位，甚至如面對沙士，大家有不安的情緒下，我們找人去淘大花園處理事情，無人拒絕去；豬流感，當我們要封一間酒店做隔離，要人去做送東西、做體檢——當時豬流感好多人是不知是什麼事情——無人拒絕去。

公務員堅守崗位專業精神，令我感動

公務員團隊堅守崗位、專業精神，令我感動。所以我對公務員充滿信心，但展望未來，衝擊不小。我期望能總結過去15年經驗，制定一套更貫徹、更透明，整個團隊都明白到特首、司長、局長、常秘做一個決定時，都知道決定的精神是什麼，之後在推行政策的時候，更明白決定的背後，體現的是港人治港、當家作主的精神。

未來的發展要靠我們的努力，當然國家是我們強大的後盾，但我們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

份，發揮香港的潛力，成為國家資產的一部份。我曾在會計師公會上講過，會計師做財務報表時，只有兩面，一面是資產，另一面是負債，無中間，中間只有一條線，今日同樣適用，相信各位都希望香港在國家資產那邊，對國家有貢獻，而不希望成為國家的負累。正如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對國家的貢獻一樣。所以在文化方面，我們怎樣進一步推動。

改進了1823

我在2007年接任政務司長時，將1823這個號碼改進了。我交給Head of EU兩件事，市民與政府的interface，可以直接感受到，例如給市民的服務，如入境處、醫管局、康文署、警隊、消防、醫護各方面，這就是市民與政府的interface。

要構建一個視市民為客的文化

要構建一個文化，視市民為客，他們要求服務的時候，不要當作“求”，作為政府一員，要提供服務，要提供得使市民覺得納了稅得到了一個高效、有禮、全面的服務。怎樣推行這種文化，全世界的公務員能否做到？全世界的公務員都視之為一個理想、目標。但要執行需要資源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我們與市民的interface，訪問過人，反應都很正面，做得當相不錯。大家換智能身份証的時候，入境處提供相當好的服務；你開車超速被影了相，被警察截停，問你拿身份証、車牌，抄牌，都很有禮貌，不是呼呼喝喝，這個都是現代化社會的文化，所以我很認同。

要與議會建立互動互信關係

你們說的公務員與管治團隊上下一心，大家貫徹到底。明白你們的壓力很多來自議會，稍一不慎，做事做得差，分分鐘給人大罵，構成好大的壓力。相信管治的理念，除整個團隊，也要與議會建立互動互信關係，必須在行政與立法機關建立互信，而不是雙方猜忌。

3問：

現時影響著公務員士氣、令公務員心中積存著不少怨氣的，舉例有：

- 1 因隨著市民的要求日益提高、民粹主義膨脹及泛政治化，公務員工作越來越困難，不受市民尊重，經常成為市民及政治人士的“出氣袋”，使到有能人士都不想做公務員；
- 2 有越來越多的公務員被襲擊（例如社署、近日的科學館等），而政府管理人員對外來壓力往往採取逆來順受、儘量滿足的態度，不少公務員更認為政府是“欺善怕惡”，令負責守關和解釋政府政策的前線人員感到沮喪；
- 3 公務員隊伍將再次面對退休高峰期，人手青黃不接及緊絀情況將更嚴重；
- 4 回歸以來，公務員薪酬調整事宜，折騰連連，不但造成隊伍內部的分化，亦令公務員與社會矛盾增加；
- 5 公務員隊伍中出現分化的情況，例如非公務員合約制員工與公務員之間的“同工不同酬/福利”、部份文職及紀律部隊前線公務員未能受惠5天工作週，等等。

對此，您有何看法？有何對策？

梁振英：

據理力撐被不合理刁難公務員

所有這些（華員會講的）都是很典型的，用英文講是“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人事資源管理的理念，有一個重要的就是士氣問題，這應該回歸到我開始時講的基本要點。

當公務員被不合理地刁難，我們要據理力撐，因為不單是為不合理對待的同事討回公道的問題，亦要令社會知道全部真相，通過對事件的了解，市民才能了解政府、公務員的表現，才可以去評定某些事情。剛才提到的科學館事件，我亦有留意到衝擊會場的事，有一位館長在目擊現場，他打電話去電台，其後在《信報》登出來，我覺得社會大眾要知道事件的真相。我們要兩手做，一手盡量消除社會的怨氣，但一些人的訴求不能被政府一下子完全滿足，仍不能夠用違反社會及議會秩序的行為，不能姑息社會上有人利用部份市民對社會、對生活、對政府的怨氣，做出破壞社會秩序，衝擊政府的事。

大部份市民支持前線公務員的工作

前線公務員的工作，絕大部份市民是支持的，肯定香港公務員的工作態度及高質素的服務。我們應該將這部份的市民爭取過來，是爭取民的人心工程。我們作為政治領導人應該站出來講話。7月1日當晚有兩批人，分別佔領了中環、金鐘，當晚11:30我離開中環的辦公室，經過現場，看到警察受衝擊。當時有部份示威者用粗言穢語，又向警方吐口水。第二日我第一個站出來予以譴責。我們的警隊是優秀的、克制的，市民大眾包括在現場的士司機十分欣賞警察的這種特質。我覺得市民應該多發聲，多些正能量出來支持我們的社會，因為這個社會是屬於大家的。

03年至今香港治安有好無壞

我有一個體會：2003年董建華先生派我上北京談自由行，當時中央領導人問我，香港準備好沒有，問我對香港治安有什麼影響，因為內地治安情況與香港不同。我對香港的警察、其他紀律部隊的工作十分有信心。從03年至今，香港的治安有好無壞。一河之隔，我們與深圳的治安還是有很大的差別；黑槍情況，台灣更嚴重。我們靠的是邊境口岸執勤的公務人員。當然政府及政府領導人要做好他自己的工作，公務員同事不要太過介意這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

唐英年：

活動提升士氣 -

成功舉辦WTO第6次部長級會議

士氣有幾個因素，首先做工作，有無成功感，滿足感。我舉一個例子，2005年舉辦WTO（世界貿易組織）第6次部長級會議。申辦時我是工商科技局局長，認為香港要在多邊會議維持影響力，促進自由貿易，所以申辦了。

申辦前已知挑戰極大，因成功申辦了，要面對示威者，尤其是韓農。結果成功舉辦，不單參與會議的政府人士，還有NGO人士均能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進行；同時那些示威者要求示威的地方是與會者能夠看得到的亦可以做得得到，透過溝通，我們了解示威者的需求，他們明白限制在那裡。新加坡等地派人來看，因為他們亦申辦了IMF（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的會議。成功舉辦後，警隊在世界的聲譽大大提高，因為做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英、美、加拿大，我親眼看過WTO非部長級會議，小型得多的，警察拿著警棍追打示威者，又放催淚彈，但是基本上我們可以維持。這個就是活動可以提升團隊的士氣。

有適當報酬－政府非刻薄僱主

第二提升團隊的士氣，要令團隊覺得有適當的報酬。當然有地方是可以改進的，基本上我不認為現在的條件是苛刻的，比起社會上一般職業，政府不是一個刻薄的僱主。

第3方面，行政長官推行5天工作週的時候，因不增加政府資源，所以有3分之1公務員由於 service hour（服務時數）或其他客觀條件不能5天工作，應重新檢討，是否進一步推行。

乙 關於醫護衛生服務

1問：

香港目前和預見的嚴重醫護衛生服務問題包括：

- 1 世界經濟衰退引致醫療成本上漲；
- 2 外圍經濟動盪，對香港未來醫療融資的影響；
- 3 公營醫療服務負荷過重，但市民個人承擔的意願和能力存疑；
- 4 醫護人員人手不足，公立醫護人手大量流失到私營機構，人力資源長遠規劃欠缺下，如何應付不斷擴大的服務需求和各醫護專業應有的發展；
- 5 香港人口增加和老化的日甚下，如何加強市民基層健康意識；
- 6 香港醫護衛生服務發展方向未明。

對此，您有何看法？有何對策？

梁振英：

醫療服務首要對象：香港居民

香港醫療服務總的水平是高的，為香港市民所稱道的，剛才提到2-3方面的問題，我首先講一個基本的理念，我覺得理念是重要、恆常的，政策可因時制宜做調整。

我的理念是香港人不分階層、經濟能力，都應該得到基本的醫療照顧；香港的醫療服務首要的服務對象，是香港居民。有剩餘能力的時候，可以發展對外服務的醫療產業，但有主次的分別。

融資問題全社會要重視

融資問題，全社會需要去重視，不單是政府，社會各界去找一個長遠的辦法，不能隨便輕視。香港370萬工作人口，住戶收入中位數是 1萬8千元/月，一半的工作人口，少於1萬元，“黃台之瓜”就這麼多了，不堪再摘。衣食住行、供樓、子女教育，剩下來，要為老年退休做儲蓄、供強積金，還要準備一些錢，應付不時之需，如看醫生等。大批市民收入低，因而積蓄少。

在收入金字塔，劃一條線，在這條線以上，市民要透過一些方式負責自己的醫療問題，由於大部份市民收入偏低，比我們想像中低，這條線要劃得高，線以下，需大幅醫療補貼，還有少部份自己負責，因此，政府公帑補貼還是很多，醫療融資問題不容易解決，但需要去解決。

醫療服務水平與人手質量分不開

我比較喜歡思考長遠問題，做比較長遠及整體的規劃，過去寫過很多關於規劃及長遠有關的東西。醫療服務的水平與人手的質量是分不開的，有需要做科學化的醫療服務評估，尤其是人口逐步老化，這個問題要正視。人手不足，如果不正確看待，外來的醫療服務使用者佔用香港醫療服務越來越多的話，問題會惡化。

唐英年：

願景：理順公私營分工協調

首先，醫療衛生開支佔政府總開支17%，是第二高，第一高教育佔24%，社福亦佔17%，今天優秀的醫療服務，做得非常好，有團隊專業精神，可使無人因經濟原因而得不到服務。

第二，醫療界的人手緊張、工時長。長遠要有一個願景，就是公營與私營怎樣分工與協調，有能力的人分流去私營醫療，而基層盡量分流到公營醫療。這是現時一個方向，長遠怎樣進一步理順。總體規劃，醫療融資只是其中一個部份，私營方面可以去私營，公營方面可提升服務。另一規劃是透過培訓來增加人力資源。

第三，深信香港醫療資源固然有限，亦永遠有限。基本法第107條又要求量入為出，醫療開支近兩三年增加比較大，希望可以達到政策目標，能夠分多一些人去私營市場。

跟著下來是公營架構怎樣做得更好。今日與以往不同，多了很多儀器，入院檢測，會做多好scan。公務員有時有怨氣，輪候醫管局服務，要好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亦向我反映過。看在那一方面可幫助大家，有何更有創意的服務，令醫管局對公務員的服務可理順多些。

2問：

應否容許港人的內地妻子來港產子？

梁振英：

港人內地妻子來港產子問題，我曾經寫過文章。有3方面人士，第1是夫婦都是香港永久居民，第2是丈夫是香港永久居民，另一邊是非香港永久居民，可能是內地或外國的，第3是社會上所講的“雙非”，父母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我覺得要看我們的醫療容量，服務應該以香港永久居民為先，之後是第2類，再之後是第3類。

唐英年：

公共資源港人優先為原則。港人的內地妻子，定會成為港人，給予相若的待遇，較易做，數量亦不是很多。數目最大的是父母雙親都不是香港人來港產子的每年有幾萬人，令婦產科嚴重超負荷。而按照《基本法》，他們在香港出生就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所以成為一個誘因。我做人口政策報告時，這是一個極之難處理的問題。因為根據《莊豐源案》當年的判決，他們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這大大增加婦產科的壓力。由於出生的小孩即時是香港永久居民，但他們會否留在香港上學，對學校的壓力很大。父母都不是香港人，都不是住在香港，是住在內地，可能是住在深圳，或者珠三角，跨境上學，使到北區的學位，基本上是用完，有些去沙田上學。因幼稚園學券資助，如留足位，不是每個都來上學，會浪費資源；

不留位，又可能不夠學位。這就涉及核心價值——right（權利），不能不給，但是他幾時 exercise right（使用權利），我們很難去掌握，如何預留是個很大的難題。所以，不只是他拿出生紙、身份証、護照時問他，會不會留在香港，問他當時的決定，還要做追蹤調查，看看你今天有沒有改變，作估算。當然時間會證明這個估算是否準確，對教育、醫療、房屋帶來很大壓力。

3問：

衛生服務專業人士多被歸類為一群沉默的中產人士，但如今他們很多人透過離職的行動或醫管局內職員論壇及眾多新聞及網上文章，向公眾宣示，表達他們的困難及對醫管局和政府各項政策和應對措施的不滿。

對此，您認為應如何穩定這一群社會支柱，使他們能堅守崗位、服務社會？

（編註：因第2節時間容許，故有此問。）

唐英年：

有時有些公務員同事跟我說：某某人退休了。我說：啊？他60歲了？不像，他55歲，不過選擇了退休。我覺得他累積了很豐富的管理經驗，55歲退休，不僅是公務員隊伍的損失，亦是社會的損失。雖然他55歲退休，但我們的管制是相當之長，好多東西他不能做，或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是不會批准的。紅灣事件後，批准的過程當中更會用顯微鏡去看。所以可否考慮予人自願延長退休，給有些人多工作幾年。但推行的話，會引起“塞車”問題，有一連串效應問題，不是簡單運用資源問題，一個公務員退了休，會有一連串的效應問題。

丙 經濟、民生

1問：

市民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更有彈性的福利，例如今今年5月實施的法定最低工資、剛在施政報告宣佈的公務員侍產假，到未來的法定最高工時、長者福利，下屆政府應否擴闊稅基及穩定/增加稅收，以保證政策可以延續？

梁振英：

暫不需擴闊稅基，但要科學化審視財政問題

回歸十幾年來，我們有財政赤字，亦有財政盈餘，如果長遠平均來看，政府的財政無大壓力。當然要慎重，要守好《基本法》規定的“量入為出”，不能夠說社會上有任何呼聲，不作任何慎重考慮就去用錢。過去幾年政府的財政仍然相當充裕，今年財政預算上，每人可以派6千元。當然，就算希望每個年頭都是這麼充裕，我們亦不能依賴，仍應該審慎理財。暫無意開發新的稅種、擴闊稅基或提高稅率，暫時不需要這樣做。

再講人口老化問題。我小學同學有一半是體力勞動，身體勞損比較緊要，踏入老年，60幾歲、70幾歲，身體的病痛越來越多。如果要靠自己照顧，怎辦？今日社會人均GDP很高，斷不能坐視我們這個社會、家裡的人，因為無經濟能力而失救。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大原則多點照顧老人，有好多工作要做，要科學化去審視財政問題，我覺得應用則用，但暫未致於要提高稅率、擴闊稅基、增加稅種這種地步。

唐英年：**短期內未有環境、空間去擴闊稅基**

我做財政司司長時，看見300多萬就業人口中，只有100多萬人納稅，200多萬人不需納稅，有很多好基層的，根本無資格納稅，因為他們足襟見肘，無錢的，這個我當然理解。但一個發達型經濟，稅基之狹窄是世上少有的，其他發達型經濟，大多數人都納稅，就算納少少稅，你問我，應有的公民責任，納少少稅。

2006年推出擴闊稅基的諮詢，本想在2005年做，只是要換特首，延遲一年才推出，結果，市民是極度反對，雖然諮詢文件說，VAT（銷售稅），能者多付，收入傾斜予有需要市民。當時時機未成熟，但這是一個好好的經驗，大家對擴闊稅基的課題認識了好多。將來是否推行，我覺得2006與2011社會變化不大，所以仍然未是時候，在短期內未有環境、空間去推行。

2問：

如何應對“十二五”規劃給香港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現時環球經濟狀況對香港未來的經濟有什麼影響？如何使香港繼續具有創富能力、保持競爭力？下屆政府對6大產業的方向、前景及推行，與本屆政府有什麼相同和不同的策略及行動構思？

梁振英：**不但鞏固更要提升香港的地位**

這些問題屬於我最近構思的十大關係之中，是政府與產業之間的關係。幾年前行政長官講，現不再講“積極不干預”，我很贊同。我倡議，官（政府）、產（產業）、研（研究單位）、學（學術組織）4方面，要結合好。

在這方面，亞太地區的內地、台灣、新加坡，做得比我們好。在“十二五規劃”裡面，關於香港那章，有很多“支持”的字眼，如“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國家支持我們鞏固及提升航運中心的地位，什麼叫做提升？如果把葵涌貨櫃碼頭的泊位擴大一倍，這是鞏固，但不是提升。

3年前，當時未有十二五規劃，我這個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與法律學院院長談話。我說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剛做了一個研究報告，認為香港有條件發展成為倫敦般國際航運中心。倫敦與香港航運中心的不同在於檔次不同，我們做搬貨的，人家做全球的買賣、融資、登記服務、保險等，所有的法律服務，不是在碼頭邊做的，是在寫字樓做的；分別在高技術，高學歷、高收入、高產業。香港如果可以提升到像倫敦般無碼頭的國際航運中心，這就是提升。我問院長及校長，我們有否條件在法律學院提供海事運輸法的課程？

官產研學結合，可找到更廣闊出路

經過一年論證、一年準備，去年夏天開課，有16位法律碩士生，有部份已經是執業的律師。政府好支持，給了3500萬元。這當然是長期的工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商學院則拿了300萬研究全國的保險融資。這是官、產、研、學的結合，香港航運界、法律、保險界十

分支持。如果我們可以切實地做，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可以為香港的大學生找到更廣闊的出路。

加強香港存在價值 用好國家的支持

類似的例子非常多，但起點是什麼？是政府要擺好它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係，這是很重要，我認為可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找到另一種出路，可以服務國家，法律、金融、海事法律方面的服務，香港比深圳、廣州、上海都有優勢。加強香港在全國的存在價值有重大的政治含意。

政府不能取代市場，我們不應該將賴以成功的要素揚棄，但是我們確實還有很多潛質可以發揮。

台灣新加坡十分羨慕香港的地位

香港現在有幾十萬人在內地工作，據當地中國香港商會人士，住在北京、上海、廣州，每個城市都約有10萬香港人，加起來這三處地方的香港人約有30萬，還不包括所謂“二五仔”——星期二上內地、星期五返香港的香港人。這批人好需要支援，可以做到讓香港一些專業人士有新的出路，可選擇在內地發展，這樣下層的優秀青年、大學生就可以填補他們的位置，就有機會向上流動。總之香港今日的地位，無論國家的支持、內地的經濟發展形勢，是很多外邊社會包括台灣、新加坡十分羨慕的。香港要用好國家的支持、發展。

唐英年： 香港品牌信得過

剛才在開場白講到政府的角色，應採取更主動、主導的角色去推動新興產業，更有前瞻性。剛才講的都是香港的品牌，就是可信、有質素保證。大家都是香港品牌大使，因為大家都有朋友探你們，不單只買品牌，好多時候都會買一些日用品回去，包括奶粉、紙尿片、中成藥。

有一次深圳王榮書記對我說，他在電視上看到深圳市民到香港買豉油，他要反省為什麼，我答他說很簡單，是他信得過。標籤外面寫著豉油真的是豉油，有人到香港買滴露，答案很簡單：信得過香港這個品牌。政府可主動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更多元化，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進一步增加經濟的穩定性。主導，即透過政府政策去助長，令產業發展多些機會。

無人說我“官商勾結”

我雖然有工商界的背景，但無人說我“官商勾結”，過去9年我公開公平推行政策，消除了疑慮。所以我們必須要有這個前瞻性、膽色，去推行一些我們認為是對的政策。一個例子是我廢除遺產稅，歷任財政司都想過，但都無推行，有好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很難評估會吸引多少資金。廢除之後幾年，在香港本地的資金是大幅地上升，所以這樣還有要有前瞻性，有這個膽量，在看準時，作一個決定，決定是要有承擔的，在立法會有人質問我，你是不是益了那些有錢人？大有錢人會透過好多合法的避稅方法，如成立信託基金。有數據支持，過去交遺產稅的多為中產人士，已經交納了薪俸稅，資產不是很多，不易搞避稅，再抽多他一層，覺得沒有這個必要，況且可以促進一個行業做大。未來可透過政策上、稅務上的誘因而來促進一些行業的發展。

座談會提問清單上的其他問題

(已交給梁振英、唐英年兩位)

甲、關於管治、公務員團隊

- 政府與公務員不單是僱主與僱員的關係，更是一個治港、施政團隊，是夥伴合作關係，您將如何去建立這種新文化？如何改善溝通諮詢？會否直接聽取公務員團體的意見？
- 公務員是政府施政的基石，如何建設鞏固它？
- 如何提高公務員的主人翁精神及使公務員的質素能與時俱進？
- 問責制已有10年實踐經驗，應否檢討，以優化其制度、發揮其優點，從而吸引有能力、有承擔的人才加入治港團隊？
- 施政並不是單靠特首一人，而需要一支管治團隊。如何發揮此團隊的協作？
- 面對將來越趨緊密的粵港合作、跨境合作，但不少公務員對國情（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及發展了解不多。對此，您認為應給予公務員（不單單是首長級人員，還包括其他高中低級的公務人員）什麼支援？
- 在泛政治化的社會氛圍下，如何維持公務員政治中立，好使公務員能更有效執行公務？
- 如何統籌各政策局、部門有效制定/推行有關房屋、扶貧、安老、醫療等政策？
- 如何有效協調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粵港跨境合作等跨部門的協調工作？
- 是否準備檢討已有10年實踐經驗的問責制，以優化其制度、發揮其優點，從而吸引有能力、有承擔的人才加入治港團隊？

乙、關於醫護衛生服務

- 衛生服務專業人士多被歸類為一群沉默的中產人士，但如今他們很多人透過離職的行動或醫管局內職員論壇及眾多新聞及網上文章，向公眾宣示，表達他們的困難及對醫管局和政府各項政策和應對措施的不滿。對此，您認為應如何穩定這一群社會支柱，使他們能堅守崗位、服務社會？
- 應否容許一個完全自由的醫療市場？在醫療自由市場環境下，能否有效控制醫療成本？會否令公私營更加失衡？
- 經濟越差的時候，社會對公營服務需求越大，怎樣的融資方法才能有效解決這種惡性循環現象？
- 如何解讀及推行香港的醫療產業化？

丙、關於經濟、民生

- 香港經濟集中於金融及旅遊業，然而這些產業受外圍因素影響較大，如何擴大產業服務，從而使香港的經濟發展更趨多元健康？
- 香港從一個小漁港發展成現在的國際大都會，都是靠肯幹、能幹、實幹的拼搏精神，如何推動今天的年青人延續這拼搏精神？
- 對鼓勵年青人創業應有何政策及支援？
- 自港英政府始，賣地向是政府一項主要收入來源，但若樓價下跌，賣地的收益亦隨之減少，下屆政府應如何在其他方面開源，使扶貧、安老、醫療等福利開支能在“量入為出”下持續推行？
- 香港貧富差距愈來愈大，而市民的不滿情緒，包括對政府施政等問題反應越來越強烈，社會亦越來越分化，矛盾越來越加深。在此情形下，應如何全力捍衛公平、公義、廉潔、法治、自由及多元包容的香港核心價值？
- 面對貧富懸殊、物價高昂、低下階層市民生活困苦，有何解決計劃？
- 社會人口老化，應如何處理及帶領一眾低下階層長者，回復基本生活及尊嚴？
- 本屆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在人口老化及利民紓困等問題上，只提供短期緩解措施。下屆政府應有何中、長遠對策？
- 香港土地稀少，土地供應有限下，居屋及公屋的土地買少見少，樓價自然上升；公營房屋供不應求；受私營市場影響，房屋供求更難預測及調節。為何香港的房屋政策不能分割公營及私營處理？居屋為何能轉型為私營供求市場內競爭？
- 市區土地供應緊絀，未來的公屋供應可能大部份集中於偏遠地方，如此會增加公屋居民的交通費用及就業問題，應如何解決？
- 有所謂“地產霸權”導致樓價不斷上升，下屆政府應如何處理？
- 除增加公屋外，是否有其他方法可幫助“劏房”居民改善居住問題？
- 香港是市場經濟，若訂立法定最高工時，對勞工及營商的影響如何？
- 現時每日有150名額讓新移民來港，加上很多持雙程證（多次加簽）的人士來港，但福利與公共資源不配合，例如新移民不得領綜援及所有福利金（包括傷殘金），令社會出現很多困難戶，社工亦束手無策，應如何應對？